

王古魯對古典小說文獻的蒐訪與研究 ——兼論北京商務印書館刊印 《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歷與內容

羅景文

摘要

由於王古魯（1901-1958）在抗戰時期與日人親近，使得他蒐訪與研究古典小說的用心與努力往往受人忽略。實際上，他對於留存域外之小說文獻的尋訪、介紹與整理，以及他在小說專題研究上的成果，在在都為古典小說的豐富繁榮貢獻心力，這份價值是不應該為我們所遺忘與忽略的。有鑑於此，本文先從王古魯的著作中鉤輯相關線索，藉以說明王古魯蒐求域外小說文獻，及其歸國之後介紹與整理這些文獻資料的心路歷程與豐碩成果。其次，探討王古魯對宋人說話與說話家數、《二拍》，以及《水滸傳》等小說專題研究上的內容，並依據學術進展給予合理的評價。最後，釐清北京商務印書館刊印《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歷與內容。這樣的討論當有助於增進學界對王古魯及其小說研究的認識。

關鍵詞 (Keywords)：王古魯；域外訪書；小說戲曲；《王古魯藏書目錄》

Wang Gulu ; Oversea Hunting for Books ; Fictions and Operas ; *Wang Gulu's Book Collection Catalogue*

羅景文：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E-mail: jjingwen123@pchome.com.tw

一、前言

古典小說研究之始即面臨到文獻闕如、目錄匱乏的窘況。也因為如此，反而使得小說文獻的整理鉤輯、著錄考訂，以及小說目錄的創建與編寫，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通俗小說研究的重心。^[1]在這個時期，不斷有小說文獻被研究者發掘、介紹，鄭振鐸（1898-1958）對此曾深有感觸地說到：^[2]

研究中國小說史和戲劇史的人，真要覺得如今是一個大時代。假如你寫了關於這方面的一部書，每過了一二年，准保你要將你的著作修改一下。因為新的材料一天天的出現，逼得你不能不時時刻刻的在蒐集、在研究。你有時因了新材料的發見而大感刺激與興趣，有時卻也要有些懊喪，因為這些新材料也許要將你的著作中的定論完全推翻了，或至少要修正一部分，或添加一部分。

鄭氏最後提到：「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勤於蒐集而已。」^[3]新文獻史料的發現常填補研究的空白、糾正原有的看法，甚至是開啓新的學術研究議題。所以，新資料的公布常常讓研究者心情為之震盪起伏，這不得不讓研究者戮力蒐求新的小說史料文獻，並關注學界的最新發展。因此，這個時期便湧現了不少重要的小說研究者或是藏書家，如周越然（1885-1962）、馬廉（1893-1935）、鄭振鐸、孫楷第（1898-1986）、阿英（1900-1977）等人。但除了少數研究者或藏書家為學界所熟知之外，其實尚有不少人並未獲得學界的關注，王古魯便是其中一位。

王古魯（1901-1958），名鍾麟，字詠仁、仲廉，江蘇常熟人，1920年赴日留學，次年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研究科學習，1926年學成歸國，歷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師，金陵、北京、中央、輔仁等大學教授，以及廣西教育廳編譯

[1] 1. 胡從經，〈聚沙成塔——小說史料學的萌發與勃興〉，《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第二章（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4），頁119-212。

2. 潘建國，〈古代通俗小說專科目錄的創造〉，《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第七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頁259-321。

3. 黃霖、許建平等著，〈上半世紀小說文獻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小說卷》第六章第一節（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1），頁121-130。

4. 苗懷明，〈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小說史料的重大發現與整理〉，《文獻》，2004：4＝總86，頁189-208。

[2] 鄭振鐸，《鄭振鐸文集》卷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5），頁432。

[3] 同註2，頁433。

處處長、河南《新中華日報》編輯。原治英國文學和語言學，後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及戲曲。1938至1941年，王氏再次赴日，任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講師，並進行小說戲曲文獻的蒐訪與調查。50年代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直到去世。^[4]王古魯在擔任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任研究員時便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學術概觀」、「日本史學家關於中國史學之研究」作為研究課題。^[5]他不僅大量翻譯日人文史著作，介紹日人的學術成果，更與日人信札往還，針對某些學術問題交流考辨、往來切磋，增進學術研究的深度，亦為中國學者爭得一席之地。^[6]除此之外，他也勤苦蒐訪留存於東瀛卻在中國亡佚的小說戲曲珍籍，將之影攝回國，並選擇部分善本影印出版。而他對於小說戲曲的研究也有不少獨到的見解。

但學界卻在有意無意之間，淡忘或忽略他的學術成就，對此，蔡毅曾云：^[7]
因王古魯在抗戰期間曾於1939年至1941年赴東京文理科大學任教，歸國後又隨周作人任北京圖書館秘書主任，主持日常館務，這些雖然都限於學

[4] 1. 〈本期撰述人略歷〉，《金陵學報》，6：2（1936.11）。

2. 常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熟市志·人物·王鍾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1），頁1099。

3. 蔡毅，〈學術翻譯與文化交流——青木正兒原著、王古魯譯著《中國近世戲曲史》書後〉，載於：氏著，《日本漢詩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7），頁310。

[5] 張憲文主編，《金陵大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5），頁157。

[6] 1. 王古魯與武內義雄（1886-1966）往來的學術討論詳見：武內義雄原著，王古魯譯校，〈六國表訂誤及其商榷〉，《金陵學報》，1：2（1931.11），頁423-471。

2. 王古魯與青木正兒（1887-1964）往來的學術論辯，以及兩人之間的情誼詳見：李慶編注，《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頁222-241。

[7] 同註4，頁310。王古魯於1942年4月至1943年2月擔任北京圖書館秘書主任（1942年9月下旬兼任存瀛圖書保管處主任），見：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10），頁785-787、1364。而王古魯在與青木正兒往來的信件中也提到：「（周作人）本年四月兼任本館館長，堅邀麟兼任秘書主任，主持日常館務（1942年12月24日函）。」日後又云：「麟自前年接收北京圖書館以來，因周公作人政務忙碌，實際上由麟負責代表執行館務。惟事務行政，積重難返，決非書生所能處理。故於善本書返館及決定豫算之後，即商同周公，辭職以輕擔負。去年一月底，即已離館矣（1944年4月1日函）。」引文見同註6之2，頁229、230。王古魯除了是周作人任職北圖時的部屬之外，他也是周作人的好友之一，周作人曾回憶云：「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適之倉皇飛往南京，未幾轉往上海，那時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魯君代為致意，勸其留在國內，雖然未能見聽，但我卻是一片誠意，聊以報其昔日寄詩之情，今日王古魯也早已長逝，更無人知道此事了。」兩人關係由此可見一斑。引文見：周作人著，止庵校訂，《知堂回想錄·北大感舊錄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頁568。

術，非關政治，但在當時均屬附逆行爲，故其學術成就長期以來罕有人言及。

中國文化向來有注重氣節的道德傳統，文人學者若是親敵事僞，時常受到嚴厲的輿論批判，周作人（1885-1967）便是最鮮明的例子。歷史書寫的內容往往由政治的意識型態決定，所謂「因人廢言」、「因人廢文」即是如此。無怪乎王古魯的學術成就，甚至是連生平也不爲人們所知。^[8]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又有新材料公布，即《王古魯藏書目錄》的刊印出版^[9]，這似乎提醒著我們，王古魯不僅是位小說戲曲研究者，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小說戲曲藏書家，只是長久以來爲學界所忽略。如此說來，這樣的發現不可謂不重大。不過，這份藏書目錄的來歷與內容值得我們進一步追索，這份目錄真的保留了王氏藏書的內容？還是記錄了其他藏書家的藏書概況？而這份目錄能否增進我們對於王古魯這位「藏書家」藏書概況與內容的了解？種種疑問，還需要進一步釐清。

回顧歷來的研究概況，當以李福眠〈王古魯的油印本〈稗海一勺錄〉〉一文最早，不過，該文大多載錄王古魯〈稗海一勺錄〉原文。^[10]而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兩書則同樣注意到王古魯海外訪書的成績。^[11]上述三者雖然都介紹了王古魯〈稗海一勺錄〉，以及他海外訪書的成果，但未能完整探討王古魯對古典小說研究之成果，顯示了小說研究史和目錄學史尚未深入關注這個問題，仍有許多需要補白的空間。而蔡毅〈學術翻譯與文化交流——青木正兒原著、王古魯譯著《中國近世戲曲史》書後〉一文當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蔡氏認爲王古魯的學術活動可以分爲兩個方面，一是「對古典小說戲曲的整理與研究」，二是「對日本漢學研究的翻譯和評介」，但由於該書重點在於探討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王古魯譯本

[8] 舉例來說，李福眠曾向何滿子請教王古魯的生平，何氏復函云：「王古魯爲日本留學生。敵僞時期曾在日本訪書，將《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等書，由日本攝像回國。另有《熊龍峰小說四種》，亦由渠引回，建國後重版。於中國通俗小說不無貢獻。詳情我亦不知。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拍案驚奇》書尾尚有王君後記，可參閱。其人約於六十年代去世。所知者僅此。特告。」見：李福眠，〈王古魯的油印本〈稗海一勺錄〉〉，載於：氏著，《天鑰書屋散札》（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9），頁251。

[9] 林夕主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編·王古魯藏書目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0），頁187-304。

[10] 同註8，頁251-255。

[11] 同註1之1，頁154-155、201-206。同註1之2，頁340-341。

的成書經過，及其在中日學術交流史上的意義。因此，對於王古魯尋訪、研究小說的成果著墨較少。儘管如此，此文已是目前探討王古魯生平資料，及其之所以受到忽視的原因最為詳盡的論述。^[12]

透過研究回顧，我們可以發現仍有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他對小說文獻的尋訪、介紹與整理，以及他在小說專題研究上的成果，在在都為通俗文學的豐富繁榮貢獻心力，這份價值是不應該被抹滅、忽略的。囿於篇幅，將集中討論王古魯對域外小說文獻的蒐集整理，以及他對古典小說專題的研究概況。因此，本文試圖先從王古魯的著作中鉤輯相關線索，藉以說明王古魯蒐求域外小說文獻，及其歸國之後介紹與整理這些文獻資料的心路歷程。其次，探討王古魯對宋人說話與說話家數、《二拍》，以及《水滸傳》等小說專題研究上的成果，再釐清北京商務印書館刊印《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歷與內容。

二、王古魯對小說文獻的蒐尋、介紹與整理

二十世紀初期海外訪書的熱潮，首先由楊守敬（1839-1915）揭開序幕，董康（1867-1947）、孫楷第、傅芸子（1902-1948）等人則繼踵其後，他們都在日本訪書而取得重大的成果，孫楷第更因赴日查訪小說，撰成《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一書，披露了許多罕為人知的小說文獻史料，讓中國學界更了解日本所藏中國小說的狀況。此書也奠定孫氏日後撰寫《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的基礎。^[13]前述學人赴日的成果給予王古魯極大地刺激，讓他興起了赴日訪書的念頭，而他留日求學的背景讓他得以熟悉日本的學術狀態，以及日本學者的研究概況，正好為他日後訪書帶來很大的便利。所以，他在回國之後便不斷地翻譯或介紹日人的學術狀態與研究成果^[14]，其中一部重要的著作便是《最近日

^[12] 同註 4，頁 302-319。

^[13] 同註 1 之 1，頁 137-153。同註 1 之 2，頁 275-280、301-304。

^[14] 他一共翻譯：

1. 田中萃一郎，〈西人研究中國學術之沿革〉，《金陵學報》，1：1（1931.5），頁 83-118。
2. 武內義雄，〈莊子攷〉，《圖書館學季刊》，4：2（1930.6），頁 217-236；〈六國表訂誤〉，王古魯後來加以修正，並附上兩人往來討論之信件原文，而成〈六國表訂誤及其商榷〉一文，《金陵學報》，1：2（1931.11），頁 423-471。
3. 服部宇之吉，〈目錄學概說〉，《圖書館學季刊》，8：1（1934.3），頁 153-157。
4. 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2），此書是王古魯所譯諸文諸書中最為人所知的，1954 年中華書局出版王氏的增補修訂本，1958 年則由作家出版社重印。

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他曾經提到寫作此書的用意和目的：^[15]

本文注意的，是（1）場所；（2）研究事項及活動情形；（3）研究及發表方法。就是說，我想把研究中國學術的機關，按著學校、學術團體、圖書館等，分類敘述其中學者士人，對於若何事項著眼，怎麼地研究，怎麼地教授，怎麼地汲引後繼。

《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系統性地依「學校」、「學術機關及圖書館」、「公私機關的研究中國問題」、「利用庚子賠款所辦之文化事業」、「明治維新以來日人研究中國學術的趨勢」等五部分，向中國學者介紹日人漢學研究的概況與成果。其中已不乏對日本重要的小說戲曲研究者，以及他們所教授的課程、研究的議題之介紹，帶給中國學界不少新的刺激。^[16]1938年，王氏再次赴日，擔任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講師，之後得到汪精衛（1883-1944）和中日文化協議會補助經費^[17]，遂在1941年進行小說戲曲文獻的蒐訪與調查。

王古魯雖然得到了經費的補助，但他在訪書時還是得面對複雜的申請手續，或是透過種種的人際關係，才能入館拍攝書影。即使能拍攝書影，他自己也是身處在艱苦的攝影環境之中，他曾回憶說：^[18]

所要攝取的書籍（日本圖書館都不容拆開書籍拍攝），由我在玻璃後面雙手用力扶攏，使得書籍平熨地緊靠在玻璃面上。拍攝的時候，如果我的雙手一顫動，或放得不平正，則所攝影片，完全失敗。攝取之後，當攝影師在照相機上換取影片紙的時候，我就謹慎地把書頁翻過，翻的時候要仔

-
5. 白鳥庫吉，《塞外史地論文譯業》二輯（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1939）。王氏又於該書卷首撰〈白鳥庫吉及其著作〉一文，此文最早刊於《金陵學報》，6：2（1936.11），頁183-199。而王古魯介紹日人漢學研究成果與概況的論文則有〈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國學術之概況〉，《金陵學報》，2：1（1932.5），頁117-160；〈日本之中文圖〉，《圖書館學季刊》，9：2（1935.6），頁143-158。上述二文亦收入：王古魯，《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常熟：作者自行出版，1936.3）。

[15] 王古魯，〈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國學術之概況〉，頁119-120。

[16] 王古魯，《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並可參見同註1之1，頁201-205。

[17] 王古魯在致青木正兒函提到：「麟此次回國，得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先生贊助，交議於中日文化協議會，補助攝取貴國公私所藏中國舊刻小說書影經費法幣陸千圓（合日幣三千五百丹左右）。現正分頭接洽。務期少有遺漏。（1941年2月8日函）」見同註6之2，頁228。王古魯氏接受汪精衛和日人的贊助，在當時不免被視為依敵附逆的行為。

[18] 王古魯，〈稗海一勺錄〉，載於：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初刻拍案驚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9），頁744。

細，否則，就翻到別一頁去，這本書就變成缺頁了。因此，攝影師和我兩個人，在暗房中，完全一心不亂地，互相呼應地，在燈光一明一滅之下工作著，每天從上午九時起到下午二時半止……，連中飯（帶去的「便當」）都是在黑暗中摸索著吃的。這樣地好幾個月在電燈一明一滅之下工作，無疑地對目力是相當有影響的。所以每天工作完畢，在微微拉開黑布窗簾的時候，我們兩人都是用自己的雙手遮著眼睛，慢慢地露開指縫，使得瞳孔不過於受刺戟，逐漸縮小，時間也得好幾分鐘，相當不好受，這是沒有實際經歷的人，恐怕不會知道這種苦況的。

除了文字的敘述之外，王古魯也附上他們當時拍攝書影時的照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照片中有一雙手用力地將書貼在玻璃上。^[19]從他所描述的文字，以及照片中那一雙緊緊扶著古籍的手的影像，我們不難想見拍攝當時他們那緊繃的神情，以及小心謹慎的態度。他們必須待在暗房裡好幾個月，一直重複這種既機械且又無聊的動作。每天拍攝完畢，王氏即至學校授課，回寓之後，必須一一檢點照片、整理次序，避免照片重複或缺少拍攝的情形，總是忙至深夜，隔天一早又得到圖書館去。正如他自己所說：「這樣的工作，如果沒有耐心去做，是做不好的。」王氏這種戮力蒐集與整理文獻的辛勞，著實令人動容。他一共走訪了內閣文庫、蓬左文庫、尊經閣文庫，以及日光慈眼堂法庫等地，最後攝得書影七、八千張，訪得在中國已大量散佚的善本古籍，成果可謂豐碩。

有別於前述學者訪書時，僅留下關於古籍的圖書形式及內容特徵的文字記錄，王古魯則以照相存真的方式保留圖書面貌。他當時攝取的部分便有：^[20]

（1）封面扉頁（因上刊書名，刊行場所以及類似廣告性之啓事，有時頗足以助考定刊行年代及變遷痕跡。）（2）序文（攝序首序尾各一葉，如序文中有足資考證各種小說相互關係之處者，則將序文全攝。）（3）凡例之類（4）目錄（今按舊刻小說，不僅因刊行書鋪或刊行年代之不同，而版形相異，且內容亦有繁簡之別，注意此點，可資考證其演變歷史。）（5）插

[19] 王古魯，〈稗海一勺錄〉前所附二幅照片，作者在照片中標明了（1）玻璃框架（2）玻璃（3）蒐集人（即王古魯）雙手扶書的影像。

[20] 同註 18，頁 749。第八條「末葉之附有刊行年月日者」之「末」原作「本」，今據王古魯於 1941 年 2 月 8 日致青木正兒函改正，見同註 6 之 2，頁 228-229。

圖之有刻工名者（明版小說插圖精者，刻工大率留名，有時可憑此考定刊行年代）（6）插圖之有關風俗習慣者（7）本文第一頁及內容有特異之處（8）末葉之附有刊行年月日者。

由於小說不登大雅之堂，加上古代著作權觀念不甚明確，書賈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之下，常有翻刻盜印、粗製濫造之事，其手法更是不勝枚舉，這也使得通俗小說的版本狀況異常複雜。面對通俗小說如此複雜多變的現象，應當審慎地運用古籍上各種可以鑑定版本的特徵來勘定版本。王古魯雖然囿於經費，無法影攝全書，但他仍試圖準確且規範地記錄每部小說上有助於鑑定版本的各種特徵，盡可能完整地反映每部小說的版本面貌與圖書形式。這種存真的態度和行為是值得肯定的，也有助於學界展開後續的研究。

而王古魯回國之後，便陸續在相關刊物上發表文章，介紹訪書的過程與成果^[21]，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文章便是附於他所編註《初刻拍案驚奇》書後的〈稗海一勺錄〉。根據這份目錄，我們可知王氏攝得全書的小說有《古今小說》、《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評林》、《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名公批點合刻三國水滸全傳》、《京板全像按鑒音釋兩漢開國中興志傳》、《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記傳》、《熊龍峰刊小說四種》等八部。^[22]而經其手鈔和校錄者小說則有《二刻拍案驚奇》、《隋史遺文》、兼善堂本《警世通言》、《李卓吾先生批評水滸傳》等四種。^[23]同時，他還攝得一百零九部小說的書影，共一千九百四十五葉。^[24]王古魯這次訪書在小說文獻史上的意義，不僅是帶回了許多重要且可靠的文獻資料，更讓中國學界得知三十六卷本《初刻拍案驚奇》之外，日光山

[21] 1. 〈攝取日本所藏中國舊刻小說書影經過志略〉，《中日文化》，1：5（1941.9），頁157-163。

2. 〈日本所藏的中國舊刻小說戲曲〉，《華北作家月報》，8（1943.8），頁40-43。

3. 〈日光訪書記〉，《風雨談》，9（1944.2），頁88-98。

4. 〈稗海一勺錄〉，《中央日報》，1948.6.28，7版。

5. 〈臨潼門寶——稗海一勺錄之一（上、續、再續）〉，《中央日報》，1948.7.12、22、26，7版。附帶一提，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誤作篇名為「臨潼『門』寶」，見頁154。

6. 〈足本西遊錄〉，《中央日報》，1948.7.29，7版。

[22] 同註18，頁745-748。除此之外，另有《鼎雕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以及《鼎刻時興滾調歌令玉谷調簪》等三部戲曲書籍。

[23] 同註18，頁748。

[24] 同註18，頁748-756。

輪王寺慈眼堂尚存有四十卷本，增進了學界對四十卷本《初刻拍案驚奇》的認識。^[25]

王古魯曾在〈足本西遊錄〉一文中提到：^[26]

現在有幾部的中國確已佚亡、絕無傳本之說部（好幾千張照片），假使能夠付印了出來，對於中國小說史及至中國文學史一部分的貢獻，無論何人不能予以否認的。

他深知學術為天下公器，文化為眾人所共用的道理。若能將這批罕見的文獻整理刊印出來，使孤本不孤、化身千萬，這的確是嘉惠學林之事。而經過他的努力，他所訪回的小說共有《古今小說》^[27]、《水滸志傳評林》^[28]、《初刻拍案驚奇》^[29]、《二刻拍案驚奇》^[30]、《熊龍峰刊小說四種》^[31]等五部小說獲得影印或排印出版。^[32]王古魯這種對文獻資料秘不私藏，採取開放、分享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這些新材料的公開，尤其在小說文獻尚且匱乏，而許多學者仍在勤苦蒐集、整理的時代中，有其特殊的價值與意義。

然而，較為遺憾的是，王古魯在日訪書時曾留下不少記錄善本小說版本形式、特點，以及重要目錄和小說序言，甚至是考校版本優劣異同的筆記，卻沒有在回國後的第一時間向學界介紹，而是被塵封了將近半個世紀之後，才由

[25] 日方則有豐田穰撰文向學界介紹，詳見：氏著，〈明刊四十卷本《拍案驚奇本》及び《水滸志傳評林》完本の出現〉，《斯文》，23：6（1941.6），頁34-40。

[26] 同註21之6。

[27] 明·馮夢龍輯，《全像古今小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10）。商務印書館排印此書時，以王古魯所攝內閣文庫本為底，而以尊經閣本補其殘闕，最後再由王古魯、張元濟（1867-1959）擔任校閱。附帶一提，譚正璧（1901-1991）曾在《話本與古劇》（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6）批評此排印本，云：「可惜校訂者頗不知尊重古籍，每多刪改之處，因此不足稱為善本。」見頁112。王古魯後於〈稗海一勺錄〉文中回應：「刪是刪了『淫穢之語』，『改』卻沒有改什麼。我希望他是在不明瞭情況下，才如此說的」，頁741。

[28] 明·羅貫中編，《水滸志傳評林》（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6）。

[29] 同註18。

[30] 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二刻拍案驚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5）。

[31] 明·熊龍峰刊行，王古魯蒐錄校注，《熊龍峰小說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5）。

[32] 除了上述五部小說之外，上海東西文化學社、金陵大學文學院曾將王古魯所攝內閣文庫藏明崇禎英雄館刊本《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合傳》照片抽出序文、圖贊等部分，影印《景印明崇禎本英雄譜圖贊》（上海東西文化學社、金陵大學文學院，1949）。

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王古魯日本訪書記》^[33]，削弱了它原本應有的學術影響力。

三、王古魯的小說專題研究

上文介紹了王古魯赴日蒐尋小說文獻的經過、以及他歸國之後對這些新資料的介紹與整理，這些文獻不僅帶給中國學界新的訊息，其實也改變了王古魯學術研究的方向，使他全力投入古典小說的研究，而他的研究成果也奠基在這些豐富的文獻之上。他所關切的課題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關於宋元話本性質的研究，一是《二拍》研究，一是《水滸傳》研究。以下將依序介紹王古魯小說專題研究的成果，並依據學術進程，給予合理的定位與評價。

(一) 關於宋元話本及說話性質的研究

王古魯關於宋元話本性質的研究，主要有〈南宋說話人四家的分法〉、〈通俗小說的來源〉、〈話本的性質與體裁〉等三篇文章。^[34]魯迅（1881-1936）認為「說話」實出於雜戲技藝，唐已有之。^[35]而王古魯則增加學界新發現元稹（779-831）聽「一枝花話」的證據，據此可知當時「說話」情形。^[36]

^[33] 王古魯，《王古魯日本訪書記》（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11）。此書一共著錄了日本公私文庫所藏十八部中國小說：內閣文庫藏明書林余季岳刊本《盤古至唐虞傳》、內閣文庫藏明書林余季岳刊本《有夏志傳》、宮內省圖書寮藏明刊本《開辟演義通俗志傳》、內閣文庫藏元刊本《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內閣文庫藏明金閭書坊舒家刊本《批評全像武王伐紂外史》、無窮會藏明刊本《封神演義》、蓬左文庫藏明萬曆丙午三台館余象斗刊本《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內閣文庫藏明萬曆末葉刊本《新鐫陳眉公先生評點春秋列國志傳》、內閣文庫藏明金閭葉敬池刊本《新列國志傳》、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刊本《新鐫全像孫龐鬪志演義》、內閣文庫藏元刊本《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內閣文庫藏元刊本《秦併六國秦始皇傳》、內閣文庫藏元刊本《前漢書續集》、蓬左文庫藏明萬曆刊本《京板全像按鑒音釋兩漢開國中興傳志》、蓬左文庫藏明萬曆十六年刊本《全漢志傳》、宮內省圖書寮藏明萬曆壬子金陵周氏大業堂刊本《東西漢通俗演義》、內閣文庫藏元刊本《新刊全相三國志平話》。

^[34] 這三篇文章均收入：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二刻拍案驚奇》作為附錄，頁805-812、813-814、815-818。其中〈南宋說話人四家的分法〉曾發表於《中國文化研究彙刊》，8（1948.9），頁139-142。

^[3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宋之話本》、〈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二文，載於：氏著，《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2000.10），頁94-95、413。

^[36] 王古魯僅云：「後來有人在《長慶集》中發見了〈元稹寄白樂天代書一百韻〉詩中，注意到兩句詩句的原註，肯定了晚唐白居易時期確已有『說話人』存在。」他並未指出原文出處。關於元稹聽「一枝花話」的證據，實由張政烺（1912-2005）考出，詳見：氏著，〈一枝花話〉，《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冊（1948.12），頁85-89。

他並提到說話人所用的底本與唐代變文極為相似，他認為這或許是「唐代說話人遺傳下來的底本。」^[37]王古魯關於通俗小說起源的看法主要仍承襲魯迅的看法，突破性不大。^[38]

王古魯對於話本性質的看法，亦承繼魯迅的看法^[39]，「說話」應該是「底本之外，再加說話人藝術（即能否『隨意生發』？）的總和。」^[40]他認為話本不論長篇短篇必然具有「篇首—正文—篇尾」的基本結構，之後他將論述的重心放在「入話」與「得勝頭回」的分別上。王古魯認為「頭回」並不等於《清平山堂話本》中的「入話」，因為這裡的「入話」指的是開篇的詩詞與對詩詞的解釋，而「頭回」只能是與正話相類或相反的故事，兩者不相混淆。到後來「入話」與「頭回」的性質逐漸混淆，因此廣義的「入話」也可以包含「頭回」，但無論如何，「頭回」的範圍不能含括開篇的詩詞，以及對詩詞所作的解釋。^[41]由於不少學者都採取廣義「入話」的觀點，也就甚少區分狹義的「入話」與「頭回」之間的差別^[42]，王古魯可以說是較早分別兩者不同性質的學者。^[43]

〈南宋說話人四家的分法〉可說是王古魯宋元話本及說話性質研究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由於古籍的記載各有不同，再加上研究者的理解有異，使得眾人對於說話家數的分法與內容聚訟紛紜。王古魯先列舉各家之說，發現各家多依據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粱錄》立說。他進而考察前

[37] 王古魯，〈通俗小說的來源〉，同註 30，頁 814。

[38] 王古魯云：「關於通俗小說的起源，我的意見，只能就較為可靠的資料來考察，不能輕率盲從一切是受外國影響的主張，毋寧實事求是地採取魯迅的看法，略加補充，這是必得說明的。」同註 30，頁 814。

[39]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宋之話本》：「說話之事，雖在說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而仍有底本以作憑依，是為『話本』。」頁 96。

[40] 王古魯，〈話本的性質和體裁〉，同註 30，頁 815。

[41] 王古魯，〈話本的性質和體裁〉，同註 30，頁 816-817。

[42] 如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上）〉，《小說月報》，22：7（1931.7），頁 934。此文載於：氏著，《西諦書話》2 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5），頁 92。鄭氏並未區別兩者的差別，文中所指的「入話」即包含「頭回」。

[43] 胡士瑩也認為「從現有的話本材料來看，它們卻可以區分開來。『入話』是解釋性的，和篇首的詩詞有關係，或涉議論，或敘背景以引入正話；『頭回』則基本上是故事性的，正面或反面映襯正話，以甲事引出乙事，作為對照。」見：氏著，《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5），頁 140。不過，胡氏卻認為王古魯對於「得勝頭回」的解釋有誤，他說：「至於稱為『權做個得勝頭回』，倒並不是意味著用一個小故事『權』充〈得勝令〉之類的音樂。」見頁 139。

述二書的成書時間，他認為說話人分四家的說法，首見於《都城紀勝》，以此書為根據「較為可靠」。因此，他依據《都城紀勝》的句法，將四家分為：銀字兒、說鐵騎兒、說經說參請、講史等四者。而前兩者總稱「小說」。王氏日後又引用《古杭夢遊錄》增強自己的論點。^[44]這個說法得到胡士瑩（1901-1979）認同，他認為「他（指王古魯）的確已把紛亂的頭緒理清楚」，並略為修正王古魯的說法^[45]，而成為目前較有影響力的看法。

（二）《二拍》研究

王古魯對於《二拍》的研究，是隨著他赴日蒐錄《二拍》的版本，以及整理、出版《二拍》而進行的。他關於《初刻拍案驚奇》的論述都收錄在他所編註的《初刻拍案驚奇》一書之中，共有〈本書的介紹〉、〈明刊四十卷本的《初刻拍案驚奇》〉、〈覆尚友堂本和消閑居本《初刻拍案驚奇》〉等三篇文章。他在〈本書的介紹〉一文中說明《初刻拍案驚奇》的出版經過，訪書當時囿於經濟因素，僅能拍攝尚友堂本少量書影，後以馬廉舊藏三十六卷「覆尚友堂本」及「消閑居本」為底本互校。並將《今古奇觀》第三十回「念親恩孝女藏兒」抽出，作為《初刻拍案驚奇》第三十八回「占家財狠墮妬侄、延親脈孝女藏兒」。王古魯接著考察每回小說的淵源，以及對後世通俗文學的影響。最後，則是針對《初刻拍案驚奇》的故事內容、思想藝術提出他自己的看法。^[46]

王古魯雖然已向學界披露了日光慈眼堂藏有尚友堂四十卷本《初刻拍案驚奇》的珍貴訊息^[47]，但他對於自己未能將三十六卷本所缺的後四回拍攝回國甚感遺憾。因此，他抽出〈日光訪書記〉中與《初刻拍案驚奇》有關的文字，而成〈明刊四十卷本的《初刻拍案驚奇》〉一文^[48]，並附上他所拍攝的書影，向學界介紹該書的版式特徵、序文、凡例，以及後四回故事的來歷淵源。他認為

^[44] 王古魯，〈南宋說話人四家的分法〉，同註 30，頁 805-812。

^[45] 同註 43，頁 105-107，引文見頁 107。但是，胡氏進一步認為應該將「說鐵騎兒」從「小說」中獨立出來，而成為真正的說話四家。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雖然贊成王、胡兩人的觀點，但也指出：「王古魯和胡士瑩兩人都誤認《古杭夢遊錄》是耐得翁的另一著作，引文也不確。王古魯在《二刻拍案驚奇》附錄的〈南宋說話人四家的分法〉改訂本中引《古杭夢遊錄》時，把版本也搞錯了，他說所據為《涵芬樓秘笈》本，其實《秘笈》中並沒有收入此書，而是在明抄本《說郛》中。」見：氏著，《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頁 570。

^[46] 王古魯，《初刻拍案驚奇·本書的介紹》，同註 18，頁 1-17。

^[47] 原書無「初刻」二字，為與《二刻拍案驚奇》辨別，故多以《初刻拍案驚奇》稱之。

^[48] 王古魯，〈明刊四十卷本的《初刻拍案驚奇》〉，同註 18，頁 717-723；同註 25，頁 34-40。

《初刻拍案驚奇》四十卷本的發現，可以釐清此書編輯和刊行的時間，也糾正學界對於後四回內容錯誤的臆測。^[49]而〈覆尙友堂本和涓閑居本《初刻拍案驚奇》〉一文，則是王古魯比較馬廉舊藏「明本」及「涓閑居本」《初刻拍案驚奇》在版本上的差異，透過他的比對，我們可以知道「所謂明本是『尙友堂覆刻本』，同時也肯定了涓閑居本文字和尙友堂足本接近的。」^[50]

王古魯在《二刻拍案驚奇·本書的介紹》一文中，提到他1947年將《二刻拍案驚奇》內閣文庫藏本的手抄本交給商務印書館，卻遲遲無法出版的經過。王氏後來刪去較為淫穢的三十四回，改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他認為這次出版的意義在於：^[51]

總可以說明代有名的《三言》《二拍》，在我國已經重新齊湊出現了，這不能不說是對於研究明清小說的同好們以及對於愛好古典短篇小說的廣大讀者們，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日本學人憑借著《三言》《二拍》等珍貴小說文獻多存於日本的學術優勢，不斷地發表有份量的學術論文，這對無緣一睹珍籍的中國學人來說頗為無奈。因此，刊行出版較為精善且可供研究的小說文本，對中國學人來說是極為迫切的一件事。所以，我們不難看出王古魯對此事的重視及興奮之情。他接著介紹凌濛初的生平與著作、內閣文庫藏本的版式特徵，以及每則故事的來歷及影響。最後，同樣是針對《二刻拍案驚奇》的故事內容、思想藝術提出他自己的看法。^[52]

值得注意的是，歷來研究者大多認為《二拍》的思想內涵與藝術層次不如

[49] 王古魯提到過去談《拍案驚奇》的學者都是依間接的證據，斷定《初拍》刊行於天啓七年（1627），如今透過《初刻拍案驚奇·凡例》可知「此書雖輯成於天啓七年（丁卯）之秋，實刊行於崇禎元年（戊辰）初冬」，頁720。而孫楷第曾在〈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中猜測《刪定二奇合傳》中第三十四及第三十六回，也許出自於三十六卷本《初刻拍案驚奇》所缺的後四回，然四十卷本一出便糾正了這個看法，頁722。孫氏看法詳見：氏著，〈三言二拍源流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5：2（1931.3-4），頁57-58。附帶一提，豐田穰在〈明刊四十卷本《拍案驚奇本》及び《水滸志傳評林》完本の出現〉一文中，認為《刪定二奇合傳》第三十四回和第三十六回應是《二刻拍案驚奇》所佚之第二十三卷及第四十卷，見頁37。然而，王古魯則認為《刪定二奇合傳》第三十四回和第三十六回實是書賈襲衍自《聊齋志異》。

[50] 王古魯，〈覆尙友堂本和涓閑居本《初刻拍案驚奇》〉，同註18，頁727-736。引文見頁736。

[51] 王古魯，《二刻拍案驚奇·本書的介紹》，同註30，頁2。

[52] 王古魯，《二刻拍案驚奇·本書的介紹》，同註30，頁2-14。

《三言》^[53]，但王古魯卻認為《二拍》是凌濛初「吸取古往今來雜事，用人民大眾所喜愛所熟習的話本形式，演成為大眾化的讀物」，是經過一番苦心經營的創新之作。凌濛初不僅批評貪官汙吏和執袴子弟的醜態，也反映了當時的婚姻問題與女子處境，觸及廣泛的社會層面。^[54]因此，在王古魯的心目中，《二拍》地位並不亞於《三言》，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卻因他的看法獨樹一幟，一直要等到八零年代之後才逐漸得到人們的迴響。^[55]

(三)《水滸傳》研究

王古魯關於《水滸傳》研究的論述主要見於〈讀《水滸全傳》鄭序及談《水滸傳》〉^[56]一文，此文其實是由〈讀《水滸全傳》鄭序〉、〈談《水滸傳》〉兩篇文章所組成。王古魯在前文針對鄭振鐸率領王利器（1912-1998）、吳曉鈴（1914-1995）等人編校《水滸全傳》^[57]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編校者雖然集合當時可見的各種版本相互校勘，但在實際進行校勘工作時不是忽略，就是甚少使用某些版本。而且編校者在校勘版本時刻意忽略容與堂本，過度重視天都外臣序刻本，使讀者容易「錯認容與本是所謂『天都外臣序刻本』的覆刻本。」^[58]由於鄭振鐸判定他所藏的五回殘卷是郭勛本，而他將天都外臣序刻本與郭勛本殘卷相對照，認為是天都外臣序刻本是郭勛本「很忠實的覆刻本。」^[59]不過，王古魯分析鄭振鐸所藏殘卷，以及天都外臣序刻本的性質後，認為鄭振鐸並沒有提出合理的證據證明他所藏的殘卷正是郭勛本，而且當時也經過何心

[53] 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云：「丁卯為天啓七年，即《醒世恆言》版行之際，此適出而爭奇，然敘述平板，引證貧辛，不能及也。」頁181。又如劉大杰（1904-1977）《中國文學發展史》云：「在不少作品中，表現出封建思想、迷信色彩，和過多的淫穢的描寫，存在著很多的糟粕。」見氏著，《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頁1075。

[54] 王古魯，《初刻拍案驚奇·本書的介紹》，同註18，頁3-4、9-16。引文見頁4。

[55] 如吳功正認為總的來說，《二拍》的成就不及《三言》，但從歷史透視力、現實洞察力和對社會資訊的檢索三方面來看，《三言》反而不如《二拍》。詳見：氏著，〈歷史變動時期的短篇小說：評凌濛初的初、二刻《拍案驚奇》〉，《文學遺產》，1985：3，頁95-100。

[56] 王古魯，〈讀《水滸全傳》鄭序及談《水滸傳》〉，《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7：1，頁145-174。王氏在這篇文章中提到自己另撰有〈《水滸全傳》校勘之校勘〉一文，見頁147。但王氏並未註明該文之發表刊物或是出版狀況，而筆者遍尋王氏相關著作，仍不見此文，故特此說明。

[57] 明·施耐庵、羅貫中著，鄭振鐸、王利器、吳曉鈴點校，《水滸全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3）。

[58] 同註56，頁145-147，引文見頁147。

[59] 同註57，頁3。

（陸澹安，1894-1980）《水滸研究》的考證。^[60]因此，王古魯認為鄭振鐸對於相關版本的判定是值得商榷的。五回殘卷既然無法證明為郭勛本，那天都外臣序刻本又怎能說是「郭勛本的一個很忠實的覆刻本」。接下來，他進一步考察天都外臣序刻本的版式特徵，他發現所謂的「天都外臣序」其實是清人補刻的，關於這點也獲得編校者之一的王利器所承認。再加上，這部書許多葉也是清初才補刊的，而且真正的郭勛本不存天壤，根本無法證明天都外臣序刻本是郭勛本的覆刻本，王古魯認為這本天都外臣序刻本有可能是書賈的偽作。天都外臣序刻本問題重重，鄭振鐸怎能據此做為校勘的底本。最後，他認為鄭氏提到一百二十回本才是完整的《水滸傳》，卻又說「征遼」、「平田虎王慶」故事是「顯著的痕跡」^[61]，鄭氏在論述上顯然有所矛盾。王古魯此文點出不少鄭振鐸等人整理校勘《水滸全傳》時的問題，但由於編校者在編校此書時宣稱運用多達九種版本，而這些版本又非一般研究者能蒐羅殆盡、完全掌握；再加上編校者的陣容享有盛名，故此書一出便成為研究《水滸》的定本，因此鮮少有人提及王古魯的意見。直到八零年代之後，馬幼垣才真正給予肯定。^[62]

王古魯則是在〈談《水滸傳》〉一文中，總結各家的研究成果與自己的心得，並糾正宋雲彬（1897-1979）〈談《水滸傳》〉^[63]文中的一些錯誤。他首先討論「水滸」名稱與梁山濼故事結合的過程，以及各種《水滸傳》版本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容與堂本是真正的李卓吾評本」，而「文簡事繁之百十回本。原出於『水滸志傳評林』，而「評林」本實在是根據古本百回本（容與堂本的底本）刪節而成的，確不是出於今行之百回本」，所以文簡事繁本「成就尚先於繁本」的看法是有問題的。他接下來將各種《水滸》版本分成三類。^[64]

[60] 何心，《水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頁44-49。

[61] 同註57，頁2。

[62] 馬幼垣，〈問題重重的所謂天都外臣序本《水滸傳》〉一文，載於：氏著，《水滸二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8），頁100-101。而馬氏也在〈嘉靖殘本《水滸傳》非郭武定刻本辨〉、〈關勝之死之謎〉、〈各種《水滸》詞典的通病〉、〈如何編校全傳式的《水滸傳》〉等文指出鄭校本《水滸全傳》的問題，上述諸文均收入《水滸二論》，亦可參看。

[63] 宋雲彬，〈談《水滸傳》〉，《文藝月報》，1953：3。上網時間：2009.1.20。網址：<http://www.lbx777.com/gjc/shz/shz05.htm>。

[64] 這三類是：

1. 施羅二氏原本類型——百回本、郭武定重刻本以及其他的百回本，都屬於這個類型，主要內容在梁山泊英雄排次以後，有「招安」、「征遼」、「征方臘」等故事。
2. 插增「王田故事」的類型——所有《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二十五卷本，《英雄譜》一百十回，新

最後，則是他對宋雲彬極力讚揚金聖嘆腰斬《水滸》之說法的批評，他認為金聖嘆腰斬《水滸》、批點《水滸》是曲解《水滸》，「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根本不是站在人民這邊。而被腰斬的內容並非一文不值，而是「具有極深刻的教育意義」。^[65]但平實而論，無論是宋雲彬還是王古魯，他們對於《水滸》看法都明顯地受到當時政治意識型態的影響。而從這篇文章，我們也可以得知王古魯在1950年8月將訪書所攝照片捐給文化部的緣由，以及捐贈的內容。^[66]

四、關於北京商務印書館刊印《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歷與內容

2005年10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套由林夕（楊成愷）主編的《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這套大型叢書共有七十冊，分為「明清卷」與「近代編」二部分，收錄明清以來中國著名藏書家所編印的藏書目錄，將原件影印出版。「近代編」除了收錄一般藏書目錄之外，還輯錄與小說、戲曲書籍相關的書目，如周越然《言言齋藏書目》、鄭振鐸《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西諦所藏彈詞目錄》、吳梅等人《吳瞿安許守白陸誠齋王孝慈所藏曲目》、馬廉《不登大雅文庫書目》、王鍾麟《王古魯藏書目錄》和吳縣潘氏（潘承厚、潘承弼）《寶山樓通俗小說書目》等重要小說戲曲藏書目錄。這些書目大部分是第一次刊印，對於古典小說戲曲文獻學、目錄學的研究有重要的意義，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些研究者或藏書家的藏書概況與內容，也能讓學界更準確地評量他們藏書的貢獻與學術價值，倘若藏書家的藏書已經亡佚，則更突顯這些書目的意義和重要性。

筆者初見《王古魯藏書目錄》，原以為此目即是王古魯記錄其小說戲曲與

鐫本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書》（即楊定見本一百二十回《水滸》，《文杏堂批評水滸傳》三十卷（即五湖老人本），《水滸全傳》十二卷一百二十回本，《漢宋奇書》一百十五回本等皆屬之。

3.「有崇禎十四年序文」的假託古本的金聖嘆的腰斬本。同註 56，頁 168。引文見頁 166。

^[65] 同註 56，頁 173。

^[66] 王古魯提到：「當時因為得到文化部藝術局有刊行古典小說的計劃的消息，因此，將我艱苦得來的《水滸傳》三種照片共三千〇七十三張捐獻文化部以供出版《水滸傳》的參考。三種是：

1. 內閣文庫藏《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百回本（即容與堂版）。
2. 內閣文庫藏《二刻名公批點三國水滸全傳》（即《英雄譜》本）一百十回本。
3. 日光慈眼堂藏《京本增補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二十五卷本（此係我訪書時新發見的完整本，此本未出現前，內閣文庫藏有殘本，自八卷至二十五卷止）從本書卷二十五大尾木記上瞭解，此書係萬曆甲午刻本，福建雙峰堂余文台梓行。最值注意的，第十一卷卷首題有『京本增補全像田虎王慶出身忠義水滸傳』，此書最近已由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同註 56，頁 162。

其它通俗文學藏書的書目。王古魯身處通俗文藝之文獻尙且匱乏，而許多學者仍在勤苦蒐集、整理的時代中，這份保留他藏書內容與概況的資料，可說是研究王古魯及其藏書的第一手資料，其文獻價值自然不可忽視。這份目錄不僅可以作為研究者追索王氏藏書下落的依據，也有助於補充學界對於王古魯身為小說研究者以外的身份的認識，因為學界從未流傳過王古魯藏書活動及其藏書聚散的軼聞故實。

因此，筆者便帶著這樣的期待心理，著手整理《王古魯藏書目錄》。但筆者在整理、分析此目的過程中，腦中卻不斷地浮現問題：第一，此目分箱著錄，最後一箱編號為「第三十四箱」，之前應完整記錄第一至第三十三箱書目資料，卻不知其中為何缺少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廿、廿二、廿三、三十、三十一箱等如此多箱書目資料，筆者檢視葉碼，發現葉碼連貫並無缺葉，顯見這是一份完整的書目。王古魯記錄書目的方式，顯然不符合藏書目錄著錄的常理。第二，同樣是此目分箱著錄書目的問題，每一箱藏書都是小說戲曲或是與其它俗文學書籍雜處，未有明確的分類，這並不符合藏書家分類藏書的習慣。第三，是此目著錄時的問題。此目著錄每一本書的書名、卷回數、版本、殘全狀況、冊數、價格，偶爾在欄上標注轉移箱數。其格式與內容如下表所示：^[67]

箱號	書名	版本狀況	函冊數	價格
1	魚水緣傳奇二卷	清乾隆刻本	4 冊	20 元
1	芳茹園樂府	明刻本	1 冊	2 元
1	結水滸全傳七十卷卷末一卷	清咸豐原刻本	36 冊 6 函	40 元
1	西遊真詮一百回	明末世德堂刻本	10 冊 2 函	20 元
1	新鐫重訂出像註釋通俗演義東晉志傳題評八卷西晉志傳題評四卷	明周氏大業堂刻本	12 冊 2 函	100 元
1	醒世姻緣傳一百回	清同治重刻本	20 冊 2 函	10 元
1	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清順治刻本	20 冊 2 函	8 元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海外訪書與進行小說研究時，特別重視版本的王古魯，竟會如此簡略地著錄每部書的基本資料和版本特徵，甚至連撰作者也全

^[67] 同註 9，頁 189。亦可參見下文圖一。

不記錄，反而是注意每部書的函冊數和價格。藏書家常在藏書目或題跋中記錄購書時的書價，但能夠清清楚楚記住每部書的書價則十分罕見，而且書價的波動並不大。藏書家花費十多年或數十年購藏圖書，其間書價應該有所差異，不太可能有一致的穩定性。種種難以解答的問題，不禁讓人對這份《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歷產生疑惑。

進一步考察這份《王古魯藏書目錄》所著錄的內容，則可以證明筆者對這份書目的疑惑是有根據的。原因在於《王古魯藏書目錄》第十六箱竟藏有海內孤本《雨窗》、《欹枕》二書。治小說史者莫不熟知此二書為小說戲曲藏書家馬廉的得意收藏。1933年秋天，馬廉在寧波舊書肆中購得一包殘書，竟意外地發現十二篇話本小說。馬廉深入研究後，發現此二書為明嘉靖洪梗清平山堂所刻，原屬范氏天一閣舊藏。這個發現不禁令他欣喜地說：「真是小說史上一段佳話，而為我平生的一樁快事。」^[68]馬廉不僅將之影印出版，還請沈兼士（1887-1947）書額云「雨窗欹枕室」做為紀念，從此也多了個「雨窗先生」的雅號。^[69]而《王古魯藏書目錄》第二十九箱正好著錄一筆「雨窗欹枕匾額」的記錄。^[70]這其中的巧合已經透露出些許玄機。筆者又於此目第二十六箱檢得《三遂平妖傳》一筆資料，其云：^[71]

《三遂平妖傳》二十回 明刻本 ⑤ 四冊一楠木匣 四百元

四卷二十回本《平妖傳》目前所知僅存三部，分別是北大圖書館馬廉舊藏、天理大學圖書館田中慶太郎（1880-1951）舊藏、傅惜華（1907-1970）舊藏。^[72]不過，傅氏藏本已殘，僅存三、四兩卷，因此海內僅存的全本只有北大馬廉舊藏本。馬廉購得此書，得意之餘，遂命其藏書室為「平妖堂」，自號

^[68] 馬廉將發現《雨窗》《欹枕》二書的經過，以及對此十二篇話本之源流的考察，撰成〈清平山堂與《雨窗》《欹枕》集〉一文，原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8：2（1934.4），頁33-48。後收入：馬廉著，劉倩編，《馬隅卿小說戲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8），頁88-101。引文見頁91。

^[69] 周作人，〈隅卿紀念〉，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苦茶隨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頁104。此文亦收入同註68，頁551。

^[70] 同註9，頁281。

^[71] 同註9，頁270。

^[72] 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5），頁129。附帶一提，傅惜華曾於《明代版畫書籍展覽會目錄》（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1944.7）介紹已藏《三遂平妖傳》，但並未提及此書為殘本，頁48。而（美）韓南（Patric Hanan）著、梁曉鶯翻譯，〈《平妖傳》著作問題之研究〉一文亦引《明代版畫書籍展覽會目錄》介紹傅藏本，然誤植引用頁碼為「146」頁。詳見：韓南著、王秋桂等譯，《韓南中國小說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3），頁144。

「平妖堂主人」。^[73]此亦為小說研究者所熟悉的故實。

以上這兩條線索已經透露《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源與內容，應與馬廉和他的不登大雅堂藏書有關。筆者再將《王古魯藏書目錄》所著錄的資料與馬廉《不登大雅堂文庫書目》的資料相互對照，發現雷同處甚多，再結合上述兩條孤本小說的證據，我們甚至可以說《王古魯藏書目錄》所著錄的內容，即是馬廉的藏書。然而，問題在於《王古魯藏書目錄》與馬廉《不登大雅堂文庫書目》著錄方式並不相同，前者顯然並非抄錄自後者。換言之，這份著錄馬廉藏書的書目必然有其它的來歷。

筆者進而檢索其它與馬廉藏書有關的書目^[74]，發現由張守謙所披露的《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最有可能是《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源。《缺名戲曲小說目錄》原為李光璧（1914-1976）生前藏書，現藏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共四十七葉，為紅格毛邊抄本。此目「無序跋題記、藏章署名、著錄年月等，封面也是空白的。因缺名，所收又多為戲曲小說，姑稱之為《缺名戲曲小說目錄》。」由於此目只簡單著錄每書書名、卷數、版本、函冊數及價格等項目，又與馬廉藏書關係極為密切。因此，張氏認為此目應是北京某書肆為馬廉所藏小說戲曲藏書，所編制的賣書目錄或估價書目。抄錄《缺名戲曲小說目錄》的時間，張氏推測應該在三十年代或稍後，不晚於1942年。^[75]筆者將《王古魯藏書目錄》

[73] 馬廉，《不登大雅堂文庫書目·第九箱·小說》云：「《三遂平妖傳》四卷二十回，東原羅貫中編次，錢塘王慎修校梓，金陵劉希賢刻圖（眉批：來薰四十五元）。」同註68，頁382。附帶一提，《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編》亦收錄馬廉《不登大雅堂文庫書目》，然此為鄭振鐸所錄之副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兩者內容略有不同，頁146。

[74] 與馬廉藏書有關之目錄，現今可知八種，《不登大雅堂文庫書目》、《平妖堂藏書目》、《缺名戲曲小說目錄》、《鄧馬氏不登大雅文庫劇曲目錄》、《鄧馬氏不登大雅堂藏曲目》、《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戲曲》、《瀋陽國立博物院馬隅卿藏書選目》、《鄧縣馬氏所藏彈詞及鼓詞目錄》。關於此八種馬廉藏書目錄的內容與概況，詳見：潘建國，〈馬廉不登大雅堂藏書及其小說研究〉，收入：氏著，《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5），頁290-295。

[75] 張守謙，〈《缺名戲曲小說目錄》及其著錄的小說罕見本〉，《天津師範學報》，1982：1＝總40，頁76-82。引文見頁76。潘建國則更準確地估計此目抄錄的時間：「考慮到《缺名書目》乃是某書肆的估價目錄，馬先生這樣一位喜愛戲曲小說研究的學者，應當不會在生前就將珍藏的書籍出售，故其上限不妨再向後延遲一年，即1935年2月19日（馬廉先生卒於北大講台）：《缺名書目》著錄了《宿花心》、《金瓶梅》崇禎本抄本等孤本小說，而這些小說現均失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這意味著《缺名書目》編定的時間下限，應在馬氏藏書售歸北大之前，即抗戰（1937年）之前。」同註1之2，頁332。

所錄資料再與張氏所介紹《缺名戲曲小說目錄》的內容相互比對，發現兩者內容無論是在書名、版本、函冊數，還是在書價上有著驚人的一致。由此可知，《王古魯藏書目錄》即抄錄自著錄馬廉藏書的《缺名戲曲小說目錄》。這份《王古魯藏書目錄》所著錄的圖書古籍的藏主並非王古魯，而是另一小說戲曲收藏大家——馬廉。

接下來產生的問題是，《王古魯藏書目錄》既然是著錄馬廉小說戲曲藏書的目錄，又怎麼會被冠上「王古魯」之名？上文提到《缺名戲曲小說目錄》並「無序跋題記、藏章署名、著錄年月等，封面也是空白的」，既然如此，抄錄者（未知是否為王古魯）在存真的要求之下，沒有寫上任何資料是可以理解。而且抄錄者熟知此目所著錄的內容實為馬廉舊物，自然也就沒有多加註明。王古魯最後鈐上他的兩枚藏章，即「古魯」和「王鍾麟印」，以作為他個人藏書的標誌。日後，這份書目流落他人手中^[76]，卻因為這份書目的訊息不夠明確，又僅有王古魯的兩枚藏章，後人未加細察，便誤會此目為「王古魯藏書目錄」（如圖一所示）。

而《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的編輯者也未察這份書目的來歷與內容，實與王古魯無關，卻將此目視為「王古魯藏書目錄」。如此一來，便有可能造成學界對這份目錄的誤解，反而混淆了研究者對於王古魯的認識。更尷尬的是，《匯刊》的編輯者將馬廉《不登大雅堂文庫書目》與《王古魯藏書目錄》比鄰而置，看似不同，其實同為馬廉之藏書目錄，其中的巧合著實令人玩味。由此可知，準確且詳盡地著錄、說明各種圖書或書目的內容及版本特徵，不僅能如實地反映文獻面貌，也能避免研究者在判別版本時發生混淆。此一錯誤也提醒研究者在運用文獻資料時，需要多加留心，切莫因為貪其方便，而忽略了查證、比對的工夫與步驟。

^[76] 根據林夕主編之《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第四十冊書前目錄可知，《王古魯藏書目錄》由古籍版本學家孟憲鈞所藏，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在孟氏之前，這份書目曾經手何人，但孟氏顯然亦未發現這份目錄實為「馬廉藏書目錄」，而非「王古魯藏書目錄」。

魚水緣傳奇二卷	清乾隆刻本	四冊	二十元
芳苑園樂府	明刻本	一冊	二元
結水新全傳七十卷	卷末一卷 清咸豐原刻本	三十三冊六函	四十元
西遊真詮一百回	明末世德堂刻本	十冊二函	二十元
新鑲重訂出像註釋通俗演義東晉王傳題評八卷	西晉志傳題評四卷 明周氏大學堂刻本	十二冊二函	一百元
醒世姻緣傳一百回	清同治重刻本	二十冊二函	十元
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清順治刻本	二十冊二函	八元
繡像雲合奇蹤八卷	八十四回 五世堂評 續英刻傳五冊 七冊	五冊	五元
海上花列傳三十回	清光緒石印本	八冊二函	四元
新刻原本回頭傳五卷	文聚齋刻本	一冊二函	四元
忠孝勇烈奇女傳	存二卷三回 清光緒中刻本	一冊二函	四元

圖一：《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王古魯藏書目錄》原件^[77]

五、結語

百年以來，小說文獻學、目錄學的發展已蔚為大觀，至今仍不斷地發展、積累，這條學術長河是由許多先行者無私的奉獻，一點一滴如涓滴細流般匯集而成的，推動了學術的進展。每一位先行者的努力與貢獻，研究者都不應該忽視，但由於政治因素或意識型態的干擾，以及囿於研究者自身的習見，往往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王古魯就是一個受到研究者忽略的例子，相信像他這樣的

^[77] 由孟憲鈞所藏《王古魯藏書目錄》原件已由上海國際商品拍賣有限公司在2008年6月1日上海「2008春季拍賣會」賣出。拍賣者亦未解此目來歷與內容，故稱其為「王古魯所藏戲曲小說目錄原稿」（編號0407），最後以人民幣22,000元成交。此目為《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王古魯藏書目錄》影印之原件，見頁189。上述拍賣訊息及本文所引圖片，詳見：「拍賣聯盟」。上網日期：2009.1.20。網址：<http://www.kongfz.com/auction/yuzhan.php?id=53862>。

戮力尋訪、研究小說戲曲的先行者還有很多，我們甚至是一無所知。這種研究空白的現象值得我們深思與反省，我們是不是過度追逐某些熱門的學術議題或是研究對象。實際上，沒有被記錄的，或是我們目前沒有看到的資料，遠可能比我們目前據以推論學術進程的「真相」的證據還多。換言之，我們未見到的現象並不代表不存在。因此，若僅據片面證據推斷學術史的演變，則常會忽視更多影響學術演進的因素，而使得我們的推論過於跳躍或片面，往往將學術成就歸功於某一人，無法呈現原本就複雜紛紜、立體多變的學術面貌。王古魯與那一代學人都為通俗文學之文獻的保存和研究投入心力，值得我們一一探究，並還原學術進程的本來面貌。因此，本文所嘗試的工作便是發掘、重估王古魯對小說文獻的蒐尋整理，及其研究小說專題的努力與貢獻，藉此覘知小說文獻史、研究史的發展。

經由上述的討論，我們不僅可以了解王古魯蒐求留存域外的小說文獻時的辛苦歷程與豐碩成果，以及其他歸國之後積極整理、出版小說文獻的努力與用心，也能得知王古魯對宋人說話與說話家數、《二拍》，以及《水滸傳》等小說專題上的研究內容，並依據學術進展給予合理的評價。最後，釐清北京商務印書館刊印《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歷與內容，我們發現這份目錄其實是另一小說戲曲收藏大家馬廉的藏書目錄。雖然，王古魯在抗戰時期與日人親近，這對於崇尚氣節的中國人來說，他的人品似乎有瑕。但無論如何，他對域外小說文獻的尋訪、介紹與整理，以及他在小說專題研究上的成果，在在都為古典小說的豐富繁榮貢獻心力，這份價值是不應該為我們所遺忘與忽略的。

致 謝

本文承蒙審查委員惠賜審查意見，讓筆者得以釐清相關問題，使本文的論點更為周全，謹致謝忱。同時感謝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王三慶教授、陳益源教授，以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研究主任龔敏先生的指導與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上海國際商品拍賣有限公司·上海2008春季拍賣會·王古魯所藏戲曲小說目錄原稿

- （編號0407）」。上網日期：2009.1.20。網址：<http://www.kongfz.com/auction/yuzhan.php?id=53862>。
- 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5）。
- 王古魯。〈日本之中文圖〉，《圖書館學季刊》，9：2（1935.6），頁143-158。
- 王古魯。〈日本所藏的中國舊刻小說戲曲〉，《華北作家報》，8（1943.8），頁40-43。
- 王古魯。〈日光訪書記〉，《風雨談》，9（1944.2），頁88-98。
- 王古魯。〈本書的介紹〉，載於：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二刻拍案驚奇》，頁1-17。
- 王古魯。〈本書的介紹〉，載於：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初刻拍案驚奇》，頁1-17。
- 王古魯。〈白鳥庫吉及其著作〉，《金陵學報》，6：2（1936.11），頁183-199。
- 王古魯。〈足本西遊錄〉，《中央日報》，1948.7.29，7版。
- 王古魯。〈明刊四十卷本的《初刻拍案驚奇》〉，載於：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初刻拍案驚奇》，頁717-723。
- 王古魯。〈南宋說話人四家的分法〉，《中國文化研究彙刊》，8（1948.9），頁139-142，載於：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二刻拍案驚奇》，頁805-812。
- 王古魯。〈通俗小說的來源〉，載於：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二刻拍案驚奇》，頁813-814。
- 王古魯。〈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國學術之概況〉，《金陵學報》，2：1（1932.5），頁117-160。
- 王古魯。〈話本的性質和體裁〉，載於：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二刻拍案驚奇》，頁815-818。
- 王古魯。〈稗海一勺錄〉，《中央日報》，1948.6.28，7版，改寫後載於：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初刻拍案驚奇》，頁737-756。
- 王古魯。〈臨潼鬥寶——稗海一勺錄之一（上、續、再續）〉，《中央日報》，1948.7.12、22、26，7版。
- 王古魯。〈覆尚友堂本和消閑居本《初刻拍案驚奇》〉，載於：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初刻拍案驚奇》，頁719-736。
- 王古魯。〈攝取日本所藏中國舊刻小說書影經過志略〉，《中日文化》，1：5（1941.9），頁157-163。
- 王古魯。〈讀《水滸全傳》鄭序及談《水滸傳》〉，《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7：1，頁145-174。
- 王古魯。《王古魯日本訪書記》（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11）。
- 王古魯。《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常熟：作者自行出版，1936.3）。
- 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 社，1992.10）。
- 田中萃一郎著，王古魯譯。〈西人研究中國學術之沿革〉，《金陵學報》，1：1（1931.5），頁83-118。
- 白鳥庫吉著，王古魯譯。《塞外史地論文譯業》1、2輯（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1939）。
- 何心。《水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
- 吳功正。〈歷史變動時期的短篇小說：評凌濛初的初、二刻《拍案驚奇》〉，《文學遺產》，1985：3，頁95-100。
- 宋雲彬。〈談《水滸傳》〉，《文藝報》，1953：3。上網時間：2009.1.22。網址：<http://www.lbx777.com/gjc/shz/shz05.htm>。
- 李福眠。《天鑰書屋散札》（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9）。
- 李慶編注。《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知堂回想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
-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苦茶隨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
- 明·施耐庵、羅貫中著，鄭振鐸、王利器、吳曉鈴點校。《水滸全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3）。
- 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二刻拍案驚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5）。
- 明·凌濛初著，王古魯蒐錄編註。《初刻拍案驚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9）。
- 明·熊龍峰刊行，王古魯蒐錄校注。《熊龍峰小說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5）。
- 明·羅貫中編。《水滸志傳評林》（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6）。
- 服部宇之吉著，王古魯譯。〈目錄學概說〉，《圖書館學季刊》，8：1（1934.3），頁153-157。
- 林夕主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編·王古魯藏書目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0）。
- 武內義雄，王古魯譯。〈莊子攷〉，《圖書館學季刊》，4：2（1930.6），頁217-236。
- 武內義雄原著，王古魯譯校。〈六國表訂誤及其商榷〉，《金陵學報》，1：2（1931.11），頁423-471。
- 青木正兒原著，王古魯譯著。《中國近世戲曲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1）。
-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5）。
- 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4）。
- 苗懷明。〈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小說史料的重大發現與整理〉，《文獻》，2004：4＝總

86，頁189-208。

孫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5：2（1931.3-4），頁11-62。

馬幼垣。《水滸二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8）。

馬廉。〈清平山堂與《雨窗》《敬枕》集〉，《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8：2（1934.4），頁33-48。

馬廉著，劉倩編。《馬隅卿小說戲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8）。

常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熟市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1）。

張守謙。〈《缺名戲曲小說目錄》及其著錄的小說罕見本〉，《天津師範學報》，1982：1＝總40，頁76-82。

張政烺。〈一枝花話〉，《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下）（1948.12），頁85-89。

張憲文主編。《金陵大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5）。

傅惜華編。《明代版畫書籍展覽會目錄》（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1944.7）。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

黃霖、許建平等著。《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小說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1）。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

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

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5）。

蔡毅。《日本漢詩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7）。

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上）〉，《小說月報》，22：7（1931.7），頁933-1056。

鄭振鐸。《西諦書話》2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5）。

鄭振鐸。《鄭振鐸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5）。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2000.10）。

韓南著，王秋桂等譯。《韓南中國小說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3）。

豐田穰。〈明刊四十卷本《拍案驚奇本》及び《水滸志傳評林》完本の出現〉，《斯文》，23：6（1941.6），頁34-40。

譚正璧。《話本與古劇》（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6）。

A Study on Wang Gulu's Hunting and Research of Classical Fiction Literature – Based the Origin and Content of *Wang Gulu's Book Collection Catalogue*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Ching-wen Luo

Abstract

Wang Gulu (1901-1958) was conversant with Japanes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o that his contribution of hunting and research of classical fiction literature was neglected by academia. However, we should not neglect of his contribution.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track of his hunting and introduction of overseas classical fiction literature. This paper then introduces the contents of his research of the Song dynasty short stories, *Erpai* and *Water Margin*, and points out the positive recognition of his research academic value. This paper finally studies discuss the origin and content of *Wang Gulu's Book Collection Catalogue* that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Keywords : Wang Gulu : Oversea Hunting for Books : Fictions and Operas : *Wang Gulu's Book Collection Catalogue*

Ching-wen Luo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E-mail: jiingwen123@pchome.com.tw